

理性的困惑*

——环境视角中的企业行为判别

陈阿江

[摘要] 通过直接排污以减少成本,企业可以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但与此同时,受污染影响的人群则付出巨大的代价。从不同角度看待此类问题,出现了经济理性的悖论。据此,提出给企业行为是否理性设定一定的空间—时间界面,进而在坐标系中加以评判的方法论问题。借用“义”、“利”概念进一步分析企业排污行为是否以及如何合乎经济理性。最后,进一步讨论了导致了水体污染、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丢失之经济理性是否合乎人类理性的一般性困境。

[关键词] 环境污染;企业行为;经济理性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09)04-0002-06

Rational Puzzle : Corporate Behavior Identity from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

CHEN A-jiang

(He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 Businesses can get better economic returns by lowering their costs in waste disposal at the expense of the pollution - affected people. Approach to such problems from different angles may lead to a paradox of economic rationality. Therefo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ethodology of setting spatial - temporal limits and making assessment in the coordinate system. Then the author further analyzes whether and how the waste disposal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corresponds to economic rationality. In the end, the paper explores the general puzzle of whether economic rationality, which has resulted in water pollution and the loss of bio - diversity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s in accordance with human rationality.

Key Words :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 corporate behavior ; economic rationality

水问题的科学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还是社会科学的研究,首先要解决一个基本的科学认知问题。就像疾病一样,如果不清楚发病机理,匆匆忙忙地开处方,是很危险的。但目前的现状恰恰是:情况不清,处方无数,治理效果可想而知。

从社会学或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讲,有几个基本问题是必须要澄清的。污染从何而来?企业主为什么要排污而造成公害?为什么有水污染防治法却形同虚设、法律无效?为什么受害

方、政府及相关人员没有成功干预这样的污染?笔者早期的关于太湖流域东村案例的个案研究,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全面地回答水污染的问题。^[1]十余年后再调查、再思考水污染问题时,发现问题更加复杂,需要解释的东西更多。近年发表的《水污染事件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指出污染事件中主要利益主体关系的失衡而产生的问题,^[2]《文本规范与实践规范的分离》试图解释为什么法律形同虚设致使水污染“一泻千里”,^[3]《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则试图说明从工业污染、城市污染等“外源污染”到村落社

区自己污染自己的“内生污染”的历程,而社区内生污染的形成昭示着污染治理将更加困难。^[4]本文拟从工业污染(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太湖流域污染的祸首)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企业主之经济理性入手,澄清困扰多时的一个基本的认识问题,进而探讨现代性中理性这个一般问题。

按照汪丁丁的归纳,经济学的理性有三方面的涵义。(1)人的自利性假设;(2)极大化原则;(3)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他人的自利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假设。^[5]事实上,人的行为比假设的经济人的行为要复杂,如韦伯(Max Weber)的四个理想类型的行动,既有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的理性行动,也有情感和传统的非理性的行动。^[6]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不仅要说明个人是如何行动的,而且意在构建从微观到宏观解释社会何以可能这样一个古老的社会学问题。^[7]

从一般意义上讲,理性是一个纯粹科学的问题,似乎不涉及价值判断。但事实上,当我们以“这样的行为合乎理性吗”诸如此类的方式提问时,提问者/回答者均已不可避免地站在一定的价值观立场进行问/答。就是说,当他提问的时候,他已经隐含了我们需不需要、合不合适这样的考虑与判断。

笔者所关注的不是关于理性行为的一般研究,而是现实中的环境问题与理性的关系。从环境问题的社会后果出发,在与经济理性人假定暗设的前提不同的环境问题面前,理性遭遇解释的尴尬——比如,企业主的排污行为到底是合乎理性的还是不合理性?我们如何从“我”与“非我”的二元对立困境中跳出“我”之视角的局限性,建立一种新的判别理性的方法?最后,在对环境问题的现实与理论的双重困境中,反思经济理性存在的价值基础。

一、经济理性与环境污染:现实悖论

田野调查期间,笔者在与企业主、地方精英的讨论中,发现企业主、地方精英陈述企业污染的原因似乎非常有理。假设企业A是一家没有进行污染处理而直接向企业外水体排污的化工厂(一个理想类型,与随后所说的企业B另一理想类型构成对照)。下面是一段虚拟的对话。

问:企业为什么要把污水排到河里?

答:企业要赚钱!

问:但企业不能昧着良心赚钱?

答:良心值多少钱一斤?(市场经济不相信良心。我们是在中国市场经济大背景中讨论问题,伦理道德虽然非常重要,但在目前阶段谈伦理道德、用良心之类的办法确实无法解决问题。所以只能切换

话题)

问:不污染难道就不能挣钱了吗?

答:办企业的目标就是赚钱,赚最多的钱——追求效益的最大化。简单说,如果企业不直排不赚钱,那么直排就能赚钱;如果不直排是微利,那么直排获利就大。何“利”而不为呢?

问:政府应该管起来!

答:乘政府还管得不紧的时候,赶快赚一点。赚一点是一点。

虽然,我们可以对这样的企业主贴上不道德、违法等等的标签。但在本文的研究中,有关环境问题的伦理道德、法律以及政府的管理等事项存而不论,仅聚焦于理性话题。所以,笔者的问题是:这样的企业主合乎经济理性吗?

企业B是另外一个理想类型。这是2008年4~5月笔者和笔者的课题组成员在太湖流域黄石水库调查的一个案例。由于水库所在的县级市域外的污染难于控制,市政府决定把黄石水库列为该市的“水缸”(水源地),将155平方公里的水库集雨区列为水源地保护区。按照相关的法律以及地方政府的实际考虑,政府实施了对水源地保护区内的工厂排污的严格管理。在黄石水库的上游还有一个早几年建成的属于本镇的“水缸”(小水库),企业B(私营油墨厂)就在小水库的上游。如果考虑黄石水库下游的太湖是上海、苏州、无锡、湖州等重要城市的“水缸”,高悬在三个“水缸”之上的油墨厂即使目前没有污染物外溢,也肯定是一个潜在风险。由于市政府的环保政策从紧,所以他们最后选择了企业转产。笔者访问了油墨企业的女主人。在去油墨厂之前,我们已经和镇工业办的储先生聊过,也调查过库区的多家企业。

女主人认为目前他们的油墨生产,政府还不一定能强制他们关闭,因为他们生产的都是国家检测合格的,没有什么问题。她还出示了相关的证书给我们看。她说,如果存在污染,还可以通过完善生产工艺等办法解决。

但是根据目前的形势、政策和未来的发展,环保要求越来越高、环保政策越来越紧将是必然趋势。

虽然这不是录自某一真实场景的对话,但包括这样内容的对话随处可见。犹如文学中存在文学的真实一样,笔者认为虚拟的对话也有社会学真实的问题。判别是否社会学真实的一个可能的方法是找相近的人员,谈论相似的话题,看看是否可以得出相似的结果。

从法律看,此类企业在水源地保护区是难于生存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法律仅仅是一个参考因素,因为到目前为止有关环境方面的法律条文大量悬置。如果水源地是外市、外省的,她的企业大约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所以他们还是对方方面面进行了认真考虑,比较了继续开厂(再停工转产)和现在就开始转产的利弊得失。“早点关,还有一个机会呢”,她说,“等到将来再关,可能大家一起关,机会就不多了,还可能会盲目地去选择某个行业。”所以,他们还是想响应政府的号召,选择与政府合作。早关可以在道义上得到支持,在信息、政策等方面的得到政府的关照。她说:“工厂早晚要关,晚关不如早关。早关换行业也早。现在信息发达,很多东西一夜之间就变了,我们镇上有一个大老板,因为行情不好,一夜之间就关门了。”

企业选择了一个渐进的转产方式。一方面,渐进转产为企业最大限度地把“应收款”收进来创造条件。企业的油墨生产设备已经有2台卖给了丹阳的一个企业,厂里还有4台在继续生产。过些时间再把其余的设备转移过去。企业利用这减产而没有停产的时间,尽量可能地把应收款收进来。另一方面,渐进转产为企业熟悉新行业提供探索时机。比如,新入行业的技术、产品销售等,要经历学习、消化和适应的过程。现在从事的是很稳妥的代加工,为其表弟的企业代加工电子产品用的塑料配件。虽然表弟提供了一个转产的机会,但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她说:“当初我们也考虑了好几个行业。如果不是表弟电子配件这个行业,我们也会考虑其他行业,比如纺织。”但有一点他们很明确,他们不想与本镇其他企业做一样的事。她说,某个企业好的时候大家一哄而上的,都做一样的,到后来就死了(资料来源于2008年4月30日对黄石水库上游某油墨厂企业负责人及镇工业办负责人储先生的访谈)。

我们注意到政策从紧是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如果没有政策收紧的因素,企业是不会主动转产的,因为按照她的理解,企业本身环保方面没有问题。最终他们选择了慢慢关闭老行业,一步一步开拓新行业的做法。笔者按照调查了解到情况的主要点制成下面的表1,以资比较。

那么,企业A与企业B的行为哪一个更合经济理性呢?

就企业A而言,从企业主角度看无疑是合乎经济理性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如从企业外的村民看,显然是不合理的;从更宏大的角度看,显然违背人类的基本理性。而企业B的选择,如果(现在看,企业转产初步成功,但仍然有不确定因素,所以用“如果”两字)企业转产成功的话,显然是合经济理性的,并且她的企业与她所在社区的利益是一致的,她的理性行动也合乎社区的理性。但与此同时,却产生了一个更大范围的污染或潜在污染的转移问题:该企业的污染/潜在污染从一个地区转移到了另

一个地区,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样做合乎理性吗?

表1 可能的方案及其比较

可能的方案	利益/前景	成本/风险	备注
不转产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现在的厂房、机器设备、技术、人员等一切照旧生产,已经开拓的市场和良好的客户群可以继续利用。 ·收益稳定。 ·没有“应收款”问题。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将来突然转产可能出现更大风险,如大家一哄而上; ·失却渐进适应新行业的时机。 	
逐渐转产(现方案)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掌握主动,充分把握企业转产更新的最佳时机; ·有从容的时间考虑转产,逐渐适应新行业; ·避免将来突然转产可能产生的大风险; ·在道义上得到支持以及少量的奖励(政府明确不予补偿),在信息、政策等方面得到政府的关照; ·利用较长的过渡期,最大限度地把握现在的“应收款”收回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老行业停产的直接经济损失; ·“应收款”收不到部分的损失; ·新行业逐渐成长,赢利水平下降; ·进入新行业的风险,新行业的技术、市场有一个熟悉的过程,存在机会成本。 	预设环保政策会更紧,关厂转产是迟早的事情。

二、经济理性的时空坐标： 认知路径的拓展

关于企业A与企业B的讨论,从认识论上讲,需要我们提供一个更宽阔的看问题的视角,以澄清关于经济理性的困惑。本文引入空间、时间变量,以时间、空间界面的取值来分析、判别是否合乎经济理性。是否经济理性一旦置于特定的时间、空间坐标系,就可以加以评判,才会有比较的结果。如果图1所示。

先说经济理性的“空间边界”。平面上的两个圆,小圆圈代表企业边界,大圆圈代表社区边界。如果将空间转化为人群的话,企业可简化为一个“点”——企业主;社区则可指企业的环境影响人群。成本-效益的计算就有两个不同的角度:即从企业的角度,和从社区的角度。如果从企业的角度和从社区的角度分别计算,评价结果是一致的,那么两个圆圈实际上为同一界面;否则就是有两个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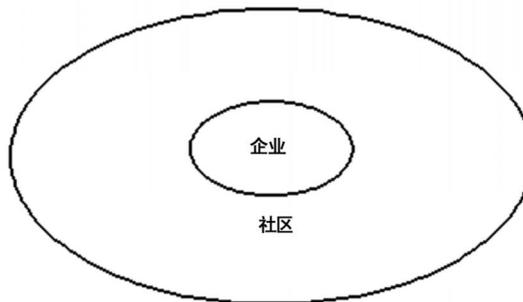


图1 评价企业经济行为的空间界面

下面结合虚拟的化工厂的排污的成本 - 效益数据(表 2)进行说明。

以 2 年为核算期,从企业的角度看,它赢利 80 万,但从社区的角度进行成本 - 效益核算时,却是负 20 万收益。即企业是以牺牲社区 100 万元的利益来获得它的 80 万元的盈余,它把本来属于它自己的成本分摊到社区其他成员的头上了。

我们还可以对企业以外设定不同的圈层,如县级行政区边界、省级行政区边界、国界。这就容易解释,为什么有些项目,企业主认为是好的项目,却会遭到附近绝大多数村民的反对;地方政府支持的项目,却遭到邻近地区的反对。

表 2 不同空间界面的成本 - 效益比较(2 年期)

成本 - 收益分析	企业	社区(含企业)
成本	劳动力、原料、设备等 20 万(不进行污水处理所以没有环保方面的成本)。	企业投入的劳动力、原料、设备等 20 万; 因为企业的污染而使社区的种植业、渔业减产损失 100 万
收益	100 万	100 万(企业)
盈亏	+80 万	- 20 万

图 1 只是显示特定时间点上的空间关系,但实际上企业与社区的空间关系是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如果这家企业继续生产,若干年以后投资建设污水处理设施,达标排放;同时对以前已经产生的污染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进行治理。以 10 年为期进行计算,那么企业可能要亏本,或者微利,但不会有前 2 年那样的高额利润了。再看社区,若干年以后,发现企业污染是重大的致病因子,导致社区居民生病,医疗费用大大增加,同时,为改善社区居民的生存环境,投入大量费用对环境进行治理。这样,以社区 - 10 年的空间 - 时间界面进行评价,可能会出现高达数千万的亏空。

经济学在解释类似的问题时,用外部性概念进行解释。但外部性概念的产生本身就暗含了这样的前提:即以我为中心的主体,和我之外为另外一方的“非我”,暗含了“我”与“非我”无法克服的对立关系。而如果从时间/空间变量去判别,则有助于超越长期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以人类自我为中心的局限性,以超越本位的视角看问题。另外,从分析技术上说,也更加明确、清晰,笔者想这就是为什么要引进时空界面的原因。

三、企业的生存空间: “义”“利”共生

污染事件使企业与其所在社区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如果企业破坏了环境,影响了所在社区的

居民,社区居民对此作出的反应,也将不利于企业的发展。持简单理性的企业主,往往会忽略企业环境影响产生后对企业自身发展的影响;但事实上,社区的存在,企业对周围人群的环境影响,一定会反过来影响企业。

中国固有的“义”、“利”概念可以借用来说明企业与其所在社区的关系。在这里,“利”被定义为企业(主)的自利;“义”被定义为企业对社区的利。义也是利,但不是企业的私利而是公益。从企业的视角看其生存、发展,可以划分为如表 3 所示的 4 种可能的关系。有两类可以归结为非此即彼的关系,“非义即利”,即通过损害社区利益获得企业自己的利益;或者,“非利即义”,即为了保全社区利益,不得不影响企业的利益。此外还有“亦利亦义”和“非义非利”的关系。显然,无论是企业还是社区,都希望“亦利亦义”的共赢局面,而不希望出现“非义非利”的局面。

表 3 “义 - 利”关系

关系对象	非此即彼		非义即利	非利即义
	亦利亦义	非义非利		
企业(主)	愿意	不愿意	愿意	不愿意
社区	不愿意	愿意	愿意	不愿意
结果	损社利企	损企利社	共赢格局	没有现实意义

计划经济时期,实际上是继承了传统文化压抑个人利益,高扬了“集体主义”的道德价值。对个人的基本利益的忽视,高调的集体主义道德价值又难于操作,所以使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效率普遍低下。而后实行市场经济,企业的基本利益得到重视和强调,但很快走向了另一种极端,除了彻底抛弃“集体主义”,如金观涛所说的呈现价值逆反,^{[8](P47)}还表现为物质主义至上。为了获取短期利益,企业不惜牺牲他人利益,破坏生态环境;为满足个人利益,不顾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不惜采用竭泽而渔的手段。比如,企业对自身产生的污染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乃至恶意排污。从短期看,企业确实可以获取高额利润。但也可能导致“非义亦非利”的后果,即企业自己最后不得不为自己的行动后果埋单,成为自己行为的受害者。比如,2005 年威胁嘉兴市 50 万居民饮用安全的 H 酒精企业,被查处后,它不仅要对受影响方给予赔偿,而且它的继续生存也成为

项目可行性研究的发展历程也显示相似的情况。项目可行性研究实践从原来的技术分析、财务评价,逐渐发展出国民经济评价、环境影响评价和社会评价,表明了对评价对象范围不断拓展,对研究对象认识的逐步深入。

问题。在一个常态运行的社会里,企业对社区造成的危害,反过来会制约企业自身的发展。

真正经济理性的企业主,他会认识到,在环境问题上,企业与社区的互利共赢是最佳的选择:对企业自己产生的污染承担起责任,妥善地进行处理,获取广大公众的支持。饭岛申子研究的日本企业也提供有意义的案例经验。在矿害问题上,日本的别子铜矿山和日立铜矿山的态度比较积极,不仅给予受害者一定的补偿,还积极地开发缓解公害的技术。经营别子铜矿山的住友家族为减少污染先是迁移炼铜厂,继而开发技术来解决它的污染问题。^{[9](P68-72)} 虽然为减少污染所进行的努力增加了经济投入,但企业并没有因为增加了成本而破产,相反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应对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得到了加强。此外,企业在社会上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这些都有助于企业长远的发展。

2008年4~5月笔者和课题组成员在黄石水库库区的田野调查发现,除了外部因素,如政策从紧,企业是否能够对企业与企业外部相互联系是否有一个客观认识十分重要。有了恰当的认知,企业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加强组织管理等手段解决企业发展中存在的环境问题。当然,技术与组织管理不是万能的,但目前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是,主要的问题不是不能,而是企业不为。事实上,高污染企业向低污染、无污染企业的转换能力比我们预想的要强得多。

四、经济理性之非理性乎？ 进一步的讨论

一个老农坐在气味怪异的“彩”河边,看着机器把河填平——工厂不仅有能力在几年里把一条清澈的河变成彩色河,还有能力把整条的河流“吃”进去。工厂正在扩大规模,拟将河流变成厂房地基的一部分。而二十多年前的这条河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下面是老农和年轻人的一段对话(虚拟)。

老农:怎么把这河填了?!

年轻人:早该填了。臭气熏天了,早填早好!

老农:但这是河啊!

年轻人:谁不知道这是河呢?但这河有什么用呢?把它填了,厂大了,大家都去上班,你也去!

老农:但这是河啊!(老农想说的是,如果这河还是原来的河的话,那凉爽的风,那清澈的水,还有水中的鱼,以及那水上漂移的小船……但他没好意思说出口,他知道对方肯定不愿意听这些过时的话……)

年轻人:你想这河填了多好,第一……(年轻人历数目前河的弊端,以及填了以后的好处)

经济理性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强势话语,非经济的、不经济的,或不合经济理性的、与经济理性视角不同的都不敢出声了。假定老农眼前的这条“没有用”的河填埋之后有很好的功用,那么,以经济价值为导向的经济理性是否存在问题呢?

试问:如果长江三角洲大量的河流水体被污染、被截断、填实,以水为特色的江南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将何以存在?水生植物、水生动物的多样性何以存在?与水紧密相关的包括水产业在内的江南特色农业何以存在?与江南水乡的文化特色,以及因地域自身的差异而形成的乡土、市镇文化的多样性将何以存在?还有,诸如老农心存的水乡河野之美景将何以存在?如果以经济理性的角度去判别,除了像周庄、同里、乌镇等等因为可以用水乡特色赚钱,其他的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

工业社会以其所特有的标准模式化一切——从地理环境到生产生活到文化,侵蚀了传统社会的自然的多样性和社会与文化的多样性。就像老农面对机声隆隆的河,不敢说出他心中对逝去的河之美感与依恋,当我们面对经济理性的质疑时——“这乡野之美到底值多少钱”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都只能无言以对。所以,我们就必须面对:除了经济理性是否还有其他可以作为判别的依据?

斯密意义上的“经济人”假定认为,如果企业发展了,有效益了,它所在的社区自然受益。^[10]但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内部的不平等、对殖民地的掠夺,以及以牺牲外部世界和后代利益为代价的公害问题是毋庸置疑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可以理解为“个人理性和社会非理性的悖论”这样的理性命题。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前者是高度理性而后者则是非理性/反理性的。^{[11](P313)}因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矛盾其制度本身所无法克服和解决的,必须用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去替代、解决。如果把哈丁的“公地悲剧”解读(哈丁的“公地悲剧”可以有不同的解读。目前国内的文献多以产权不清这样的方式解读公地的悲剧。事实上,至少还可以有两个解读。一是个人理性和集体行动的非理性的解读,二是对现代社会人的能力与环境承载力关系演变的解读。放牧是否过度暗含了一些前提假设:牲口总量与这片公地的总承载力的关系。一是在较早的游牧阶段,草场的承载能力相对于牲口“无限大”,所以不

嘉兴市局办.造成兴城镇地表水厂停水事故的责任者已查明. <http://www.jepb.gov.cn/cn/huanbaoxinxi-text.asp?id=124>.

存在是否过度的问题。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内蒙古草原的草场与牲口可以看成接近这样的理想类型。二是随着技术的发展,牲畜疾病防治技术的提高,牲畜繁殖技术的提高以及冬饲料储备等技术和手段的完善,牲口总量的逐渐增加到接近草场的总承载能力,这时多个个人的多养,就可能造成公地悲剧。三是为了不使公地产生悲剧,公地使用者的内部协调是必要的。所以即使是早期的“草场的承载力相对无限大”的时期,牧民还是有规则地使用牧场的,而不是无序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哈丁“公地悲剧”的故事是地球人能力不断增长且无序而使地球不堪重负的缩微版)为环境版的个人理性与集体/社会非理性的理性困惑,那么哈丁的“公地悲剧”与马克思理性命题是一致的。哈丁假设,在一个开放的公共牧场,每个牧民的占优策略是尽量多地养牛、多用公共牧场放牛。就个人而言,他尽量多地养牛、多占草场,显然是经济理性的。但每个牧民都这样考虑和行动的后果,是牧场过度放牧,以至于牧场荒芜,最后造成了集体行动的悲剧。^[12]韦伯在对现代社会合理化(理性问题)分析过程中,发现我们现代人正在为现代社会的“铁笼”所困,留给了我们一个没有答案的遗产。^[13]

总之,目前因工业排污而形成的一些环境问题,是与企业主的简单理性^[2]——即短时窄空界面的经济理性有密切关系。在政策制度等外部压力下,企业主如果改变观念,确立相对长远的发展目标,妥善处理企业与外部社区的关系,诸如目前的一些恶意排污的格局将会得到控制。但是,环境问题依然存在,比如作为“世界工厂”的长三角地区,每个城市都非常理性地发展自己的经济,整个长三角地区是否能容得下那么多的工厂?大量的河流被截、填埋,水田变成了工厂(水田本身也是水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后果是什么?当太湖流域遭遇环境压力的时候又开始向苏北和其他地方理性迁移污染企业,其后果是什么?再者,以“浅生态”角度看有什么价

值的“多样性”等,我们是否需要“深生态”主义者的胸怀,去珍视这些多样性?怎样才算是理性地看待这些问题,是需要我们深刻反思的。□

[参 考 文 献]

- [1]陈阿江. 水域污染的社会学解释[J].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 (1).
- [2]陈阿江. 水污染事件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J]. 浙江学刊, 2008, (4).
- [3]陈阿江. 文本规范与实践规范的分离——太湖流域工业污染的一个解释框架[J]. 学海, 2008, (4).
- [4]陈阿江. 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太湖流域水环境恶化的社会文化逻辑[J]. 学海, 2007, (1).
- [5]汪丁丁. 经济学理性主义基础[J]. 社会学研究, 1998, (2).
- [6]丘海雄, 张应祥. 理性选择理论述评[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 (1).
- [7]詹姆斯·S. 科尔曼, 著, 邓方, 译. 社会学理论的基础[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0.
- [8]金观涛, 刘青峰. 中国现代思想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第一卷)[M].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0.
- [9](日)饭岛伸子. 环境社会学[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 [10](英)亚当·斯密, 著, 郭大力, 王亚南, 译. 国富论(上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2.
-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12]Gret Hardin. “The tragedy of commons”[M]. Science, Vol. 162, No. 3859.
- [13](德)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7.

收稿日期 2008 - 10 - 09

[责任编辑 韦光化]

[责任校对 刘秀玲]

[作者简介] 陈阿江(1963~), 江苏吴江人,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 邮编: 210098。